

青年视界·沈杏培主持

媒介变革与传统的公共阐释

——以《红楼梦》的经典重构为中心

刘名扬

摘要：本文以《红楼梦》的百年公共阐释历程为中心，考察媒介变革驱动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经典传承与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认为，媒介变革持续推动文学阐释的公共化：清末民初，报章媒介催生的“小说话”等文体，使《红楼梦》阐释从私人评点转向公共论域，知识精英在社会功利与审美自律的多维论争中开启其现代意义生成；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古典精神“大传统”与现代影响“小传统”的变奏中，从利用“旧形式”走向创造性转化，不断激活《红楼梦》以人载世、向内超越的叙事智慧与精神气韵；及至当下，网络同人、短视频、弹幕等新大众文艺形态使其进入去中心化的公共阐释空间，实现从“精英经典”向“人民文化”的飞跃，却也面临“使用”传统与意义消解的紧张。这一历程表明，文学经典的传承需要在“存放”精神内核与“激活”当代价值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国路径。

关键词：《红楼梦》；公共阐释；经典活化；新大众文艺；中国路径

在新大众文艺勃兴的当下，《红楼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媒介重构与意义再生。从清末民初报章媒介催生的阐释公共化，到20世纪中国文学对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再到当下互联网平台的众声喧哗，这一脉络贯穿着媒介变革推动文学公共化的深层逻辑，也面临着如何在“使用”传统的同时守护其精神内核的命题。

晚清民初，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展开和报章、出版社等新型媒介的兴起，《红楼梦》第一次从私人化的阅读评点进入由印刷媒介构筑的公共空间。铅字排印、定期出版与副刊栏目培育出“小说话”等新型批评文体，使阐释者从传统

的评点家扩展为活跃于各报的职业报人、自由撰稿人与普通读者。在《新闻报》等报刊上，时事化的戏谑解读、索隐考辨的多元论争与日常化的闲谈趣评杂然共处，政治意义、道德意义、美学意义第一次被置于“公共”平台上进行交锋。如果说清末民初的媒介变革使古典文学进入了“公共论域”，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演进则进一步展现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渗透的复杂图景。从20世纪50年代对“旧形式”的利用，到“寻根文学”将传统作为表现对象，再到先锋作家“回归古典”的创造性转化，以及新世纪文学在文体、语言、时间观上的

多维探索,当代文学在“如何传统”的追问中开辟着“怎样现代”的可能。《红楼梦》作为“大传统”的集大成者,经历了从形式范本到表现对象,再到精神气韵之源头的三次超越。

如今,互联网平台的参与性、即时性与算法分发机制,为《红楼梦》的公共阐释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带来新的紧张。网络同人改写十二钗命运,短视频用户借“黛玉体”抒发情绪,弹幕文化生成“红学梗”与跨文本“梦幻联动”;这些去中心化的参与使传统经典从精英论说走向“人民的文化”。本文通过考察《红楼梦》百年公共阐释的媒介谱系,揭示传统如何在每次媒介变革与价值重估中被激活,探讨在“存放”精神内核与“激活”当代价值的辩证统一中,如何使大众消费与人文教育良性互动,探索经典“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国路径。

一、私语与公议： “小说话”与现代红学的发生

按照阐释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生成的。从这个角度看,考察清末民初《红楼梦》的阐释史,不仅是对这部经典的一次再理解,也是窥探中国文学现代发生史的重要路径,更是理解当下新大众文艺中《红楼梦》现象不可或缺的历史参照。学界已注意到,清末民初《红楼梦》阐释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公共性”转向,论者从社会正义、审美自律等角度将这部古典小说推向公共议题,其现代意义由此开启。^①在思想史层面,西学东渐的冲击、启蒙思潮的引导与知识精英的倡导常被视作主要驱动力;若将目光从观念转向媒介的物质条件,便会发现一种更隐蔽的力量:公共阐释的诞生,离不开报纸副刊、文艺杂志和现代出版机构这类印刷媒介对传统评点空间的重构。

清代《红楼梦》的阐释,长期依托于两种媒介形态:其一是抄本上的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这些文字附着于正文之侧,本质上是读者与文本的私人对话;其二是程刻本行世后兴起的评点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人的评注虽面向更广的读者,但其形态始终“附着于文本”:评点文字与小说正文共享同一页面,读者

购买的是“评点本”,而非“评论文”。两种形态共享一个根本特征,即批评不具备独立于文本的传播可能。现代报刊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自19世纪90年代后期起,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政论报刊,以及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等出版机构,在沿海口岸城市构筑起一套全新的媒介基础设施。铅字印刷的机械复制能力使同一篇文章可以同时被数万人阅读,周期性出版的定时投递培养了一种稳定的阅读预期,而“栏目”这一排版形式对文类进行了有效的区隔与培育,催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样式:以独立的篇章形态面向匿名的公众发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痛陈旧文学为“社会之虱”^②“无用之呻吟”^③,谭嗣同宣称在“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④当抛弃全部旧学之诗。他们的焦虑正在于尺牍、诗集手稿、私人刻书这类传统文学载体已无法支撑现代意义上的信息扩散与公议建构。当报刊成为思想传播的主渠道之后,它天然地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公共话题性”的阐释。《红楼梦》正是在这种媒介逻辑的驱动下,第一次从私人书斋走向了公共版面。

这一转变最鲜明的外在标志,是一种被称作“小说话”的批评文体的兴起。黄霖指出,小说话的名目虽晚至1903年才由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倡用,但其体式可追溯至乾隆年间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和徐凤仪的《红楼梦偶得》,是一种以“随阅即评式直接体悟、随笔漫谈式率性表达”为主要特点的批评形式。^⑤他进而将“小说话”定位为古今转型、中西交融中的产物,认为它们“承传了传统,吸取了新识,见证了历史,影响了现实,是一座可贵的小说史与小说批评史的资料库”^⑥。传统小说话多以专书

① 参见管雪莲:《清末民初小说观念转型与〈红楼梦〉阐释的公共化》,《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② 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第4版),第22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③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④ 李敖主编:《谭嗣同全集》,第205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⑤⑥ 黄霖:《关于中国小说话》,《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行世,处于文人著述的序列之中;现代报刊则将小说话改造为副刊上的固定栏目,赋予它全新的发表节奏和阅读语境。温庆新在讨论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建构时注意到,小说话批评者的身份极为多样,“既有叶小凤(楚伦)、周瘦鹃、谢六逸、李涵秋等彼时小说创作与批评名家,亦有胡惠生、徐敬修等专门小说研究者,有琴楼、臞菴、鸠拙等一般的读者,更有叶绍钧(圣陶)等社会名流”^①。这一作者构成的驳杂性,本身就是报刊媒介低门槛发表机制的产物。尤为关键的是,小说话的文字多是随读随记的片段,任才情与趣味自行流转,无意于周密严谨的论说。这种风貌本就是它作为报刊文体自觉的取向,所追求的恰是与读者围炉漫谈、悠然会心的阅读体验。

媒介如何具体地重塑《红楼梦》的阐释形态,彼时很多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提供了观察窗口。《新闻报》便是其中之一。^②该报先后辟设《快活林》《新园林》《艺海》《茶话》等副刊,在近四十年的出版历程中持续刊出与《红楼梦》相关的各类文字。这些文字在版面上与新闻、广告、连载小说、剧评影评杂然共处,所提供的是一种即时、碎片化的轻阅读。恰是这一“轻”的质地,构成了清末民初印刷媒介中公共阐释的底色。1919年10月6日,《新闻报》副刊登出一封署名“林黛玉”的读者来信,全文不足二百字:“顷阅贵报快活林内,载有林黛玉改嫁他人一则,与事实殊不符合。妹之迟迟未嫁,为恐不得其人,得拥巨资以娱暮年,亦曾计及。惟目下此事,完全无凭。该报所载原文一节,尚存报端,用特专函更正。”^③这封“来信”将林黛玉塑造为一个拥有真实社会身份、懂得维权并主动要求报社更正“不实报道”的主体,借读者对林黛玉这一人物的共同认知制造错位的幽默。在这里,批评可以是趣谈,阐释者不必是专家,也可以是一个细心的读者。这种“轻”的批评方式,恰恰是报纸副刊的媒介特性所催生的,它降低了批评的门槛,使《红楼梦》的讨论从专家之学变为日常谈资,从而极大地扩展了阐释的参与面。

与这种闲适的趣谈形成对照的,是另一批带有强烈时事色彩的小说话。它们将《红楼梦》

的情节、人物直接嵌入对政局时事的评论之中,借小说言说当下。《读〈石头记〉感言》以排比式的感兴笔法将《红楼梦》的阅读体验与民国初年政局的动荡叠合在一起:作者将王熙凤弄权与内务司腐败对应起来,将贾迎春出嫁时宝玉的凄凉感慨与唐绍仪退出内阁的政治失意互相映照,最后以大观园比附中华民国,将两者归结于同归“太虚幻境”的虚无感。^④唐绍仪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愤而辞职,用“第二次内阁瓦解”暗指陆徵祥内阁的倒台,文章将小说人物的命运“翻译”为现实政局的判断。1912年9月,仰伯在《新闻报》上分两期连载《订红楼内阁谱》,^⑤将上述时事化的“游戏文章”推向更成体系的形态。文章按内阁各部编制,将贾元春拟为国务总理大臣、林黛玉拟为内务部总长、王熙凤拟为财政部部长、薛宝钗拟为外交部总长,依次配齐十一钗与十一阁员,每拟一人皆附以简要评语。此类将《红楼梦》时事化的阐释实践,在此后三十余年间不断重现,而且随着时局变化调整其议题。^⑥时值北伐节节推进、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之际,柳蓀在《新红楼梦索隐》中借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一节影射时局。他将贾府夜宴解读为“暗含北方肃杀之象”,将贾母命女伶先演《将军令》再演《惠明下书》解读为隐隐指向“出兵救难”,又将探春、李纨、宝钗三人协理家务视为“一新内阁的模样”,却断言“不过是敷衍搪塞”。^⑦作者将元宵夜宴的叙事段落当作解读时局的密码本,从

① 温庆新:《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州学刊》2024年第1期。

② 《新闻报》于1893年2月17日创刊于上海,由中外商人合资,英商丹福士为总董,蔡尔康任主笔,1899年转由美商福开森接办,20世纪20年代末股权售给中国商人,后大部分归于史量才,与《申报》长期并称“申新”或“新申”,1949年5月因上海解放而停刊,是近现代极有影响力的大报。

③ 《林黛玉的来信》,《新闻报》1919年10月6日。

④ 寄鸥:《读〈石头记〉感言》,《新闻报》1912年8月4日。

⑤ 仰伯:《订红楼内阁谱》,《新闻报》1912年9月15日、16日。

⑥ 例如摩门:《活画的一部〈红楼梦〉》,《新闻报》1914年5月16日;柳蓀:《红楼梦索隐别记(记簿仪事)》,《新闻报》1925年3月9日等。

⑦ 柳蓀:《新红楼梦索隐》,《新闻报》1927年2月17日。

唱戏、放炮仗到管家换人,逐层读出“衰败”“崩解”的征兆,借红楼的“情节语法”来组织对时局的理解。而到了1949年,《革命的文学:〈红楼梦〉与〈西游记〉》将宝玉出家解读为“向封建势力反抗”,并引出“中国如果要自由要民主,只有彻底清除这种专制余毒”的结论。^①一个多月后,解放军占领上海,《新闻报》随之停刊。这张报纸副刊上的时事化阐释贯穿了帝制终结、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充当着连接文学经典与政治现实的话语形态。

《新闻报》上的红学文字除却时事化的戏谑与感兴,还容纳了篇幅更长、论证更严谨的文字。1930年夏季,该报副刊上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红学论争”。公达发表《红楼小语》,系统反驳俞平伯《红楼梦辨》的“自叙传”说,坚持“宝玉影射纳兰容若”的传统索隐立场。公达从纳兰容若《饮水词》中搜罗了大量可与《红楼梦》互证的词句,如“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照应黛玉葬花;“不成独睡只思量,还剩旧时月色在潇湘”照应潇湘馆意象,以此论证《红楼梦》处处暗藏纳兰心迹。^②薛寒梅随即以《续红楼小语》回应,他开篇称“读公达君红楼小语,考证贾宝玉影射纳兰容若,认为确凿无疑”,随即另辟蹊径提出林黛玉影射唐寅的新说。^③薛寒梅从唐寅居桃花庵、葬花作诗的行为与黛玉葬花的对应关系入手,逐一比对二人的籍贯、身世、性格乃至临终焚稿的结局,甚至注意到“六如名寅,其父亦名寅(雪芹之祖曹棟亭亦名寅),故假黛玉之名以传”这一名讳上的巧合;其间又有《红楼梦抉微》将《红楼梦》与《史记》笔法相勾连,提出“《红楼梦》一书,乃是效仿《史记》”,认为曹雪芹承袭了太史公借自序抒发隐微心志的笔法。^④陈积勋则在《红楼梦之作者》中综述纳兰容若说、曹雪芹说、董小宛说等多种观点并逐一辨析,对薛寒梅的黛玉影唐寅说提出了谨慎的质疑。^⑤这几篇文章彼此征引、相互辩难,构成了一个小型的论争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争发生在日报副刊上,论辩的节奏跟随报纸的出版周期,读者可以在数日之内追踪起承转合。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虽然采用了索隐、考证等貌似学术的方法,但他们发言的最终对象却是报纸的普通读者。仲寅在《我之红楼梦观》

中回顾了这些论争并感慨道:“《红楼梦》一书,不必拘泥于对应单一人物,也不必拘泥于对应单一史实。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至真至切的情意,正因如此,才能流传千古……”^⑥这既可视作对索隐派的温和批评,也可以视作对整个报纸红学论争的总结陈词: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多元解读最终往往归于对小说“真情”价值的确认。

综观这批从民初延续至1949年的红学文字,印刷媒介对阐释实践的重塑至少体现于三个层面。其一,阐释者身份的重构。作者均为活跃于沪上的职业报人或撰稿人,他们进入《红楼梦》的方式,是在报纸这一公共平台上以言说介入公共议题。其二,阐释行为的功能转向。无论是将宝玉的凄凉感慨转化为对内阁危机的政治抒情,还是将红楼群钗的戏仿转化为对“内阁不得其选”的失望表达,抑或将三海总统府指实为“大观园”、从元宵夜宴中读出时局征兆,这些对《红楼梦》的言说本身就是对公共议题的参与。其三,阐释形态的多层并存。时事讽喻、索隐论辩、诗词品评、社会新闻与电影报道在同一版面空间中共生,面对不同趣味的读者,形成了印刷媒介独有的阐释生态。这种多层生态的根基在于印刷资本提供的技术条件:铅字排印使同一篇文章可为数万读者同日共读,定期出版培育了读者对“下一期”的阅读预期,副刊栏目的划分则在各文类间建立起可辨识的边界。媒介本身就参与着经典的生成与重构,《红楼梦》从一部供私人静观的小说,逐渐转化为流动在报纸版面之间的公共文化资源。

在小说的日常化与报人的时事化写作持续开展的同时,知识精英对《红楼梦》的学术阐释也在印刷媒介中寻找着各自的发言位置。不同性质的媒介孕育了不同的路径。在维新与革命话语激荡下,政论报刊天然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社会政治议程的解读。使人在梁启超组织的《小说丛话》中将《红楼梦》解读为对专制

① 文弟:《革命的文学:〈红楼梦〉与〈西游记〉》,《新闻报》1949年4月3日。

② 公达:《红楼小语》,《新闻报》1930年7月11日。

③④ 薛寒梅:《续红楼小语》,《新闻报》1930年7月25日。

⑤ 陈积勋:《红楼梦之作者》,《新闻报》1930年8月2日。

⑥ 仲寅:《我之红楼梦观》,《新闻报》1934年1月16日。

王权、家族伦理、社会罪恶、旧道德的系统性批判,蔡元培以民族主义为底色的索隐实践将排满革命诉求编码入小说阐释。^①这些论述在报刊上声势浩大,恰因它们契合政论报刊所要求的“公共议题”逻辑。严复和夏曾佑曾强调欧美和日本“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②,梁启超推崇西方“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借小说发表政治议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③这些论述既是小说理论的宣言,也是报刊编者对阐释方向的暗中规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王国维与成之基于审美自律论的阐释路径。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借叔本华哲学论证《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强调“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并反对索隐派“以考证之眼读小说”的做法。^④成之在《小说丛话》中否定考据家对《红楼梦》本事的追索,提出“十二金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者也”,进而指出“苦乐非实境,所谓苦乐者,实人心所自造也”。^⑤这一努力将《红楼梦》从政治工具论的解读中拉回审美本体,同样依托于新型印刷媒介所提供的言论空间。《〈红楼梦〉评论》最初刊发于王国维自己主编的《教育世界》,该刊以纯学术与美育为旨趣,不为政论时评所驱,恰为系统引入康德、叔本华美学提供了从容开展的平台。正是在这样一种媒介环境中,无论是以社会价值为旨归的功利阐释,还是以审美目的为旨归的自律阐释,都将《红楼梦》从私人化的索隐猜谜、评点赏析转变为承载时代思想的公共文化议题。媒介与观念的双重变革,使《红楼梦》第一次进入由知识精英主导、面向社会公众的文化公共领域。

二、形式与精神：

当代文学对《红楼梦》的创造性转化

从媒介变革的视角看,每一次技术迭代带来的文艺形态转型,都伴随着对文学传统的重新审视与激活。^⑥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引下,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家们开始自觉利用“旧形式”创作新内容。《吕梁英雄传》《烈火金钢》等作品借用章回体形式表现革命斗争主题,赵树理吸收话本

传统,追求小说语言的“可说性”,创作出贴近群众的“问题小说”。然而,这些实践并未创造出真正“为政治服务”的“民族形式”。评论界对章回体的形式套用未予充分肯定,认为“革命英雄传奇”故事性过强而未能写出人民群众的成长;作为“方向”的赵树理虽在“人民群众的语言”方面获得认可,却也因“新人”形象不清晰而受到批评。相较而言,并未局限于“旧形式”的《红旗谱》反而因其表现出的“民族风格”、对农民阶级成长的深入书写,被誉为“民族形式”探索的里程碑。这一理论倡导与批评实践之间的错位,说明“民族形式”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文学传统一旦被简化为“旧形式”,便难以承担建构“民族形式”的历史重任。^⑦詹姆逊指出:“当过去时代的形式因素被后起的文化体系重新构入新的文本时,它们的初始信息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与后继的各种其他信息形成新的搭配关系,与它们构成全新的意义整体。”^⑧当代小说在利用“旧

① 侠人观点参见侠人:《小说丛话》,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89-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蔡元培观点参见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另见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54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② 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9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③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3),第3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④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原著,聂树斌选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 王国维卷》,第115-131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

⑤ 成之:《小说丛话》,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4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⑥ 关于媒介变革与文艺形态转型的关系,可参见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的核心观点:“媒介即讯息”,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进而引发艺术形式的变革。[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第1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⑦ 参见郭冰茹:《如何传统,怎样现代》,《上海文学》2026年第3期。

⑧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第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形式”创作“新内容”时,将文化传统所蕴含的多重信息杂糅进“民族形式”和“新内容”中,形成了混合着“旧”与“新”的“意义整体”。在这一过程中,何种“传统”能够被呈现、以何种方式呈现,取决于不同时代语境中作家的文化选择。^①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作家对传统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形式可用”的层面,他们试图拆解古典小说的外部构件为新的政治内容服务,尚未意识到传统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文学传统真正实现当代表达,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冯骥才在《神鞭》中创造了一种杂糅着荒诞与写实、象征与思辨、古典小说的白描与通俗小说的戏剧性的意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民间的生活日常成为传统的载体,传统由此摆脱了单纯的形式意义,成为可以被书写、被呈现的“内容”。小说中“辫子”这一核心意象包含着传统本身的悖论:它是祖传绝技的象征,代表着农耕文明的身体技艺和宗法伦理,在天津卫的码头上所向披靡;当洋人的枪炮将其打断后,主人公傻二剪掉辫子、练成神枪,宣布祖宗的东西再好,到了该割的时候也得割。^②冯骥才将传统本身推向了被审视、被思辨的位置,传统成为小说内部要处理的核心命题。这一转变为《红楼梦》传统在当代文学中的显影提供了新的路径。随后兴起的“寻根文学”更直接凸显了这一认识。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点明文学需要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③而呈现这些“传统”的方式恰恰是非常现代的小说写作技术:叙事时间的跳跃、叙事视角的不断切换、叙事人的灵活转换。这种“用现代写传统”的方式,为古典传统在当代的激活提供了启示:传统的精神内核可以与现代的技术手段相融合,在“新形式”中焕发新的生命力。随后以形式实验出场的先锋作家们在创作探索难以持续后,通过“回归古典”突破写作瓶颈。

然而,与寻根文学将传统视为表现对象不同,苏童的“老瓶装新酒”或莫言的“大踏步的后退”,首先关注的仍是写法、形式问题。苏童谈及《妻妾成群》时说“力图在此篇中摆脱以往惯用的形式圈套,以一种古典精神和生活原貌填塞小说空间”,并且“尝试了细腻的写实手法,写人物、人物关系和与之相应的故事”。^④他

的作品不仅在故事层面重新剪辑、重组了“三言二拍”拟话本中时常讲述的“閨巷新事”,而且深谙话本小说的叙事技巧,通过处心积虑的铺垫和煞有介事的渲染,达到了古代话本小说普遍存在的“常中见奇”的叙述效果。莫言在设计《生死疲劳》的结构时想到了章回体,他说:“我想是不是可以给每一章起个小标题……就想到用章回体,因为章回体的标题字数多,能够全面地把这一章的内容概括出来。”^⑤李敬泽评价《生死疲劳》时指出:“《生死疲劳》是一部向我们伟大的古典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这不仅指它的形式、它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忠诚,也是指它想象世界的根本方式。”^⑥在此,《红楼梦》所代表的“想象世界的根本方式”——“以人载世”、人物带动世界——被重新激活。正如李敬泽所言:“人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人物带动着他的整个世界,比如《红楼梦》,整个世界跟着那个人颓败下去……这恰恰是古典小说的根本精神,现代小说已经遗忘了这样的志向,而《生死疲劳》让我们记起了那种宏大庄严的景象。”^⑦苏童创造性地借用话本“头回”形式,将其中短篇小说划分为若干个明确的叙述单元,利用叙述单元之间的空隙轻松灵巧地实现叙事时间、空间和人物的转换。莫言的《生死疲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章回小说,但他放大了章回小说中的“闲笔”功能,将闲笔转换成动态性的故事片段或完整的小故事,插入长篇主体,形成一种节外生枝的“树型结构”,即主干叙述直线向上,插入部分在不干扰主干叙述的同时生出枝节,增大了叙事容量,也使文本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

事实上,“回归古典”的文本实践本身也无法做到内容与形式的截然分离。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提供了一个从形式回归到精神气韵的渐进式样本:《人面桃花》通过白描、用典、意象

① 参见郭冰茹:《如何传统,怎样现代》,《上海文学》2026年第3期。

② 冯骥才:《神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③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④ 苏童:《自序》,《苏童文集 婚姻即景》,第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⑤⑥⑦ 莫言:《碎语文学》,第274、278-279、27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及草蛇灰线布局,古典气息明晰可辨;《山河入梦》中古典形式标识减少,生活流与意识流交织出现代质感;至《春尽江南》,古典形式特征几乎隐去,格非转向从精神气韵层面靠近中国小说传统经由世俗、世情、人情实现的“向内超越”。^①正如他所言,中国哲学与文学具有“不离世间而超越世间”的特色,“江南三部曲”围绕“桃花源”展开的人物与命运,正体现出这种向内超越,接通了《红楼梦》“大观园”作为精神乌托邦与世俗红尘相对照的叙事原型。格非的实践表明,当传统被理解为精神气韵才真正获得了在当代文学中重新生长的可能。

世俗人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本质书写对象,《红楼梦》的故事世界,于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见人情世故,于花开花落、人来人往中体悟生命。20世纪90年代以降,小说对世俗生活的描摹日益受到重视。贾平凹的《废都》《秦腔》等作品在日常琐细与精神困顿中展现传统伦理的现代困境;王安忆的《天香》将佛理禅意融入造园、刺绣等日常活动,化“物我同一”为民间生生不息;王跃文的《家山》、老藤的《刀兵过》则将仁爱大义的传统伦理作为承载家国情怀的建设性力量。这些创作均“不离世间”,却以不同面向回应《红楼梦》所开创的“世情书写”传统。贾平凹的“泼烦琐碎”与《红楼梦》的世情书写之间既有承继也有变异。《红楼梦》写柴米油盐,始终有“大观园”作为对照性的精神空间存在,世俗与超俗构成张力;贾平凹的《秦腔》则取消了这种对照,清风街上的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陷落,日子中的琐碎成为传统本身分崩离析的见证。这意味着,《红楼梦》所代表的“世情书写”传统在当代的激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俗生活与精神归宿之间关系”这一古典命题的重新追问。

传统价值理念的介入,促使当代小说重新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现代小说常写人物与环境的紧张关系,通过“人在历史中成长”的模式建构主体性;中国古典小说则讲求“以人载世”。贾平凹的《废都》《暂坐》、李洱的《应物兄》均表现出这种“人物带动世界”的载世方式。王安忆则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在《长恨歌》《启蒙时代》等作品中,她以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形神

不散的人物来承载时代变迁,正如《启蒙时代》所言,市民力量在于“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②。此种主体性更接近道家“物我同一”的哲学,与《红楼梦》中“在日子里活着”的人物形象形成精神呼应。传统时间观的融入,则让当代小说在线性时间之外开启了另一重维度。线性时间观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深刻影响着现代小说的叙事逻辑;而中国古典小说受儒释道融合影响,形成了关注因果、循环、轮回的时间观念,《红楼梦》的“还泪”神话与金陵十二钗判词即其具象表达。当代小说在向传统回归时,常将两种时间观叠加使用。《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并未置换线性叙事,而是叠加其上,既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忠诚,又呈现了作家的历史意识。格非“江南三部曲”的每一部以线性时间推进,三部作品串联起百年家族命运,至第三部以梦境回转至开篇人物与事件,完成整体结构的闭环。可以说,当代小说正是在轮回时间与线性时间的碰撞中,以“回归”的方式重新感知世界、理解生命。与20世纪50年代在“线性进步”的时间框架中借用章回体相比,这一代作家对传统时间观的吸纳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转变:将时间本身作为审美体验的对象。这正是《红楼梦》将季节流转、花期更替、人事代谢的时间意识作为叙事肌理本身的体现。

当代文学的“回归古典”还体现在文体观念与语言意识的自觉上。文体四分法是知识界对传统“杂文学”观念的现代改造,但随着文学从一元走向多元,固定模式难以为继。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率先突破形式壁垒,韩少功在《马桥词典》《暗示》中实践“文史哲打通”,祝勇的“故宫系列”、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李洱的《应物兄》、王尧的《民谣》等作品,亦在虚构与非虚构、小说与散文之间自由穿行,以文体融合回应古代“杂文学”传统;《红楼梦》本身就是熔诗、词、曲、赋、诔、偈、联额、灯谜、酒令等于一

① 格非:《中国小说与叙事传统——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格非在此文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古典小说“向内超越”的精神特质。

② 王安忆:《启蒙时代》,第2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炉的集大成者。^①语言层面,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唤醒的正是《红楼梦》所代表的融雅入俗、雅俗共赏的汉语传统。与此同时,民间方言作为传统的另一载体也备受重视:从赵树理对“群众语言”的运用,到冯骥才“津味小说”、王朔北京话的文化质感,再到贾平凹、张炜、刘震云、阎连科以方言反思现代性,直至《繁花》《燕食记》打破雅俗二元对立,以一种融会贯通的方式处理传统与市井的复杂面向。《红楼梦》的语言世界本身就是“雅言”与“方言”的交响:贾母、刘姥姥、薛蟠、茗烟各色声口各异,这种“因人设语”“按头制帽”的语言意识,恰为当代作家处理雅俗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以上梳理呈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如何传统”的探索历程:从50年代对“旧形式”的借用,到80年代将传统作为“表现对象”;从90年代先锋作家对古典叙事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到新世纪文学在文体融合、语言自觉、时间观重构等层面的多维探索。每一次“回归传统”的努力,都是在回应时代命题的过程中激活传统资源,生成新的文学可能。在这一历程中,《红楼梦》经历了从“形式范本”到“表现对象”,再到“精神气韵的源头”的三次超越,但始终在精英写作的边界内进行,传统的激活由作家主导,在文学体制内部完成。格非曾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中经由“世俗”“世情”“人情”完成的“内在超越”视为中国小说的“大传统”,而将受西方现代性影响、对“大传统”的批判与改写视为“小传统”。这一划分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所身处的文化现实,大小两个传统彼此渗透,混杂着“本土”与“西方”,共同构成了我们讨论“如何传统”的历史语境。作为“大传统”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既在20世纪以来的“小传统”中被反复阐释、改写与激活,又在新大众文艺的当下语境中成为接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关键媒介。^②

然而,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文学场域发生了分化。图书市场、畅销书机制、影视改编和网络传播的介入,文学“传统”的界定权不再由精英作家和评论家独享。二月河的帝王小说成为畅销书,电视剧《红楼梦》引发全民讨论,“国学热”催生大量通俗读物,《百家讲坛》将古典文本转化为大众视听产品……同一部《红楼

梦》,在精英作家的笔下是召唤叙事智慧的文学资源,在出版商的选题表中是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品牌,在普通读者的阅读中则可能是情感慰藉或社交谈资。“如何传统”这一命题在当代中国的展开,从一开始就呈现为精英探索与大众消费两条路径的并行与交错。

三、承与变：新大众文艺中 《红楼梦》的活化与反思

新大众文艺的勃兴,使《红楼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媒介重构时代。如果说清末民初的报章媒介将《红楼梦》从私人化的阅读评点推向公共讨论平台,那么今天的互联网则以其更强大的连接能力,将这部传统经典推入一个更为广泛、更为多元、更为流动的公共阐释空间。

新大众的参与方式多元而活跃。在晋江文学城、起点中文网等平台,以“红楼梦”为主题词的网络小说近千部,写作者们或以穿越者的身份介入大观园,试图改写十二钗的悲剧命运;或以现代职场逻辑重述荣国府的权力博弈;或以女性主义视角重构人物关系。这些红楼同人创作的本质,是在“填补历史之缝隙”“补充人物之经历”的意义上扩展《红楼梦》的叙事空间。“每一个文本都是一部疏懒的机器,要求读者也分担部分工作”^③,同人创作正是借助原著的留白,将那些未曾详述的经历、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甚至完全虚构的情节纳入红楼故事世界。《红楼梦》相关故事、场景、人物在短视频平台的流行,则是将这种情感投射从长篇叙事压缩为即时的文化符号。例如,抖音、小红书上“黛

① 关于《红楼梦》的文体融合特征,可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的论述。鲁迅著,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第161-1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② 陈平原认为,《红楼梦》在20世纪的命运,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缩影”。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2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③ [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黄寤兰译,第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玉体”的传播,用户借黛玉之口抒发职场委屈,借黛玉之姿调侃情感纠葛,或只是表达一点小小的不满——“你大抵是倦了”“这怕不是又被哪位哥哥伤了心”。这些仿写往往脱离《红楼梦》的具体语境,却捕捉到了林黛玉身上某种可以共情的特质:敏感、犀利、不愿将就。“黛玉发疯文学”甚至成为网络热词,使古典少女卷入当代人的日常情绪。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本质上是一个情感的容器,跨媒介传播使其成为舒缓时代情绪的一个出口。黛玉形象的流变,从“病弱忧郁”到“机智俏皮”再到“嘴替怼怼”,正是不同时代情感投射的产物。这种传播方式虽将《红楼梦》压缩为碎片化的语言符号,却在情感共鸣中维系着经典与大众的精神联结。

在互动视频游戏与衍生游戏领域,这种参与进一步从“观看”延伸为“扮演”。《红楼梦》衍生游戏以独特的叙事方式介入当代“红楼世界”的建构,呈现出两个值得关注的叙事特征。其一为“戏剧化叙事”,即以文本再现与创意改编为核心动力,将原著情节转化为可互动的戏剧性场景。在橙光游戏平台上,以《红楼梦》为主题的互动阅读作品达63款,《拯救十二钗》吸引逾15万玩家参与,^①部分作品的文本体量堪比一部长篇网络小说。这些游戏将《红楼梦》由“可读”文本转化为“可参与”的叙事空间,玩家以选择推动剧情,实则通过“扮演”进入经典世界。其二为“类交互体验”,一种在游戏中营造“控制错觉”的叙事机制。玩家兼具“玩家”与“剧中人”双重身份视角,但其选择并不能从根本上撼动故事的核心走向。恰如原著“假作真时真亦假”之语,玩家在游戏能动性,本质上是对原作叙事权威的想象性逾越。剧本杀游戏将这一机制推向更具沉浸感的维度,《红楼梦中人》《红楼缥缈录》等作品借助场景还原与角色扮演,使玩家获得“身临大观园”的在场体验。此类游戏侧重推理与真相还原,而《红楼梦》原著本身的叙事留白与伏笔暗线,恰好为这类重构式改编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

弹幕文化中生成的“红学梗”,则将这种情感共振推向即时交互的层面。在各种流媒体平台上,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每一秒画面都可能被“意难平”“袭人是真的忠”“凤姐这波在

大气层”等即时评论覆盖;用户从过去文化产品数不胜数的碎片中拣选重组新的叙述、故事、对象和行为,在“代骂、陪读、逗乐、点评”中形成虚拟在场的情感共振。更值得注意的是,弹幕文化中衍生出“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刘姥姥误入白虎堂”等跨文本“梦幻联动”,以戏谑的方式打破了经典之间的界限。这种互动机制使《红楼梦》的接受从单向观赏转变为多向共创,他们在虚拟空间中共同参与经典的言说和再建构。跨媒介传播参与着古代通俗小说经典化无穷尽意义的生成。^②

百年前,《红楼梦》的公共性体现为众声的交锋,如今这种公共性依然存在,却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网络写手的同人创作、短视频用户的黛玉体仿写、弹幕文化的即时吐槽、影视改编的现代性探索,共同构成了一幅更为嘈杂、分散的阐释图景。倘若从媒介时间性的角度对两种公共阐释形态加以比较,清末民初报刊上的《红楼梦》阐释,本质上是一种“历时性”的公共交往。读者投书报社,从寄出稿件到见报之间存在时间差;论者撰文回应前人观点,从阅读到写作到刊出,间隔以日甚至以周计。这一时间差为公共讨论保留了理性论辩的空间。而弹幕文化中的“红学梗”则属于“共时性”的交往,这些文字是在观看的同一瞬间被激发的即时反应。它们在空间上叠加于影像之上,与影像本身构成一个“同时在场”的复合文本;在时间上,每一条弹幕都是对正在发生的情节的同步回应。这种共时性交往不设时间差,不需要编辑环节的中介,参与的门槛被降到最低。具体说来,这一变革首先呈现为参与主体的位移。从“知识精英”到如今的同人写手、弹幕发送者、流媒体平台的博主,他们未必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甚至未必通读过全书,却以自己的方式“使用”着这部经典。从精英主导到大众参与,从理性论辩到趣缘聚合,当代《红楼梦》阐释的公共性,呈现出鲜明的“去中心化”特征。与主体转变相伴的,是

① 蔡悦、张政君:《“剧式表达”与“拟交互性”:〈红楼梦〉IP衍生游戏的叙事解码》,《文艺评论》2025年第6期。

② 常娟:《跨媒介语境中的〈红楼梦〉图文关系嬗变——从文人画到网络视频》,《文艺评论》2024年第5期。

参与动力的置换。清末民初的知识精英将《红楼梦》视为阐发理想的载体,“新民”“救国”“改良群治”这些宏大题旨,驱动着他们从文本中读出现代政治、道德哲学与美学主张。今天的人们介入《红楼梦》,动力却更多地来自情感共鸣的需要。《红楼梦》在此扮演的角色,更像一个“舒缓时代情绪的出口”。这种动力机制的转变,也带来了内在的紧张。一方面,情感化的公共性使经典以前所未有的广度进入大众视野,那些未接触过原著的公众,通过短视频、弹幕、同人创作走近《红楼梦》,在“代骂、陪读、逗乐、点评”的虚拟互动中获得情感的慰藉;另一方面,这种参与方式天然带有碎片化、即时化、浅表化的倾向,经典的深度被简化为可供消费的“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共性的变异,常常被裹挟于流量逻辑与资本逻辑之中。平台算法偏爱“颠覆性解读”,网友沉迷于“打破认知”的快感,二者相互强化,催生一种“流量驱动的公共性”。

若以 20 世纪中国文学“如何传统”的探索历程为参照,反观当下新大众文艺中的“红楼”现象,便会发现这种内在紧张,恰恰是历史经验的当代延续。互联网平台以其前所未有的连接能力、参与性和即时反馈机制,为《红楼梦》的公共阐释提供了比清末民初更为广阔的空间。然而,正是这种技术赋权,也带来了精神内核被消解的风险。在短视频平台上,“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刘姥姥误入白虎堂”之类的“梦幻联动”,固然以戏谑的方式打破了经典的边界,却也使人物形象脱离了原有的精神脉络,成为仅供娱乐的“梗”。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下,《红楼梦》被纳入“IP 开发”的产业链条,每一次跨界都在为经典“赋能”,每一次跨界也都在将经典“变现”。这种异化的危险在于:它使《红楼梦》的接受停留在浅表的“使用”层面,而未能进入深层的“对话”层面;它让大众习惯于消费《红楼梦》的符号,却疏离于理解《红楼梦》的精神,即面临因过度娱乐而走向意义缺场的困境。

面对这种内在紧张,简单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显然无济于事,将“新大众”的“使用”传统一概斥为对经典的亵渎,既不公平,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早已点明:

“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①对于《红楼梦》这座“宅子”,既不能因噎废食地将它“存放”于博物馆中仅供瞻仰,也不能不加辨析地“使用”而消解其精神内核。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使用”传统的同时,避免对其精神内核的消解。近年来的红楼传播实践中已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尝试:一批短视频博主采用“精讲”形式,每期聚焦原著中某个细节,在几分钟的篇幅内展开细致的文本分析,播放量往往不逊于“魔改”类内容;B 站上一些高校教师开设的红楼解读系列,将学术讨论置于弹幕的即时互动之中,学生随时提问,教师在后续视频中回应,形成了学术引导与大众参与的良性互动。这些实践表明,数字媒介的传播形态关键在于以何种机制引导技术赋权的方向。由此反观当下的“红楼”现象,或许可以找到一条“存放”与“激活”辩证统一的可能路径。“存放”意味着对经典精神内核的敬畏与守护,保持对其“不离世间而超越世间”的精神气韵的理解,保持对其在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见出生命悖论,在花开花落、人来人往中体悟存在本质的审美方式的尊重。“激活”则意味着允许在媒介融合的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引导大众在“使用”传统的同时,逐步接近其精神内核。网络写手以现代职场逻辑重述荣国府的权力博弈,若能在“宫斗”的表象下触及《红楼梦》对人情世态的深刻洞察,便是对“世情书写”传统的当代激活;短视频创作者以当代情感观念重新演绎宝黛的爱情悲剧,若能在“虐恋”的外壳下传达《红楼梦》对生命悖论的哲学思考,便是对“人情书写”经验的当下激活;在弹幕文化中生成“红学梗”的即时传播,若能在“吐槽”的形式下延续《红楼梦》“草蛇灰线”的叙事智慧,便是对经典阐释传统的交互式激活。

清末民初的知识精英以“公共性”视角重释《红楼梦》,赋予其现代意义;20 世纪的作家

① 按,鲁迅原文:“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41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以“创造性转化”的方式激活《红楼梦》的叙事智慧,使其成为现代文学建设的精神资源;今天的新大众同样在以自己的方式“使用”《红楼梦》,使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作为“大传统”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所承载的“向内超越”的精神气韵、“以人载世”的叙事智慧,需要在与“小传统”的对话中不断被激活;将其置于新的历史语境中,使其与新的问题意识、技术手段、表达方式相融合,从而生成新的意义。前提是,我们能够在“使用”传统的同时守护其精神内核,能够在技术赋权的时代条件下保持对经典的敬畏,能够在多元阐释中坚持对深度的追求。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传统媒介与数字媒介中的公共阐释有着不同的生成机制。清末民初印刷媒介中的公共性建立在“共同的阅读经验”之上;而数字媒介中的公共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算法的可见性分配”之上,一种阐释能否被“看见”,取决于它能否通过平台的流量筛选,阐释的“可见度”并不等同于其“公共价值”。这一区别提示我们,对数字时代公共阐释的考察必须追问:在看似去中心化的参与结构中,何种力量在暗中重新分配着阐释的可见性?

结 语

传统是在每一次媒介变革、公共讨论、价值重估中被不断激活的资源,而以“新大众”的身份参与经典的“使用”与重释,不仅是媒介变革的延续,更是一次具有质的飞跃意义的文化事件:经典正从知识精英的论说对象,真正成为“人民的文化”。而参与主体的扩展,也使经典阐释从“精英的独白”转变为“众声的合唱”。然而,当下活化“传统”现象的“众声喧哗”同样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审视,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要在开放讨论中引入必要的学术引导。关于传统跨媒介传播和创造性转化,海量的作品难免良莠不齐,需要研究者和评论家及时

予以评价、纠偏。对于那些既尊重原著精神又融合新时代气象的创造性作品,应予以肯定;对于那些能够真正激发公众兴趣、点燃年轻人阅读热情的作品,应予以扶持。其次,大众文化消费与经典人文教育应形成良性互动。在肯定数媒时代“传统热”的同时,也要避免“唯流量”的倾向,仔细辨析“流量”背后是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新时代的生活经验,还是哗众取宠、吸引眼球。文学经典接受和阐释过程中的大众化倾向有其限度,难免遮蔽经典中深邃、精致和复杂的思想与叙事方式,专业的经典研究者“坐冷板凳”取得的文化成果不可替代。最后,要探索“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可行路径。^①一方面,要倡导创作者从原著文本出发,挖掘传统的当代价值,避免对经典进行无节制的异化消费;另一方面,要帮助创作者寻找与经典的“精神共鸣”,寻求与当下日常生活的契合点,促进二者的“视界融合”。经典与传统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持续引发共鸣,正因其对人情世态的深刻洞察、对生命悖论的哲学思考,始终有着与每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形成对话的可能。

【本文系江苏省作协2026年度重点扶持文学创作与评论工程文学项目“从‘文艺大众化’到‘新大众文艺’:百年中国文学大众化问题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名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①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关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强调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它关乎我们如何在媒介变革中让传统成为活的资源,让经典成为人民的文化,让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走出一条接通血脉、面向未来的“中国道路”。